

Tiebout 模型的研究： 50 年来的进展

踪家峰 李 蕾

内容提要：1956年Tiebout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文章，开创性地提出了“用脚投票”的著名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地方公共物品问题，自此开始了地方财政/公共经济的研究，Tiebout为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0年来，人们围绕Tiebout(1956)开展了大量工作，不断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着地方公共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本文从模型提出的背景与模型的创新之处、对模型的支持与批判、财产税问题、财政/税收竞争问题等几个方面评述了Tiebout模型50年来的发展。

关键词：Charles Tiebout Tiebout 模型 50 年研究综述

一、引言

1956年Charles Tiebout (1924 ~ 1968)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了文章《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用脚投票”著名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地方公共物品的问题，为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经济学科乃至政治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的50年间特别是1970年以来，人们仍不断对其原创性的成果进行认识、探索和完善，并将其研究扩展到公共经济学外更广泛的领域。《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也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可以说没有Tiebout (1956)就没有地方财政学。本文从四个方面对Tiebout模型50年来的研究脉络及其主要发现进行梳理：第一个方面是阐述Tiebout (1956)提出的背景以及Tiebout模型的创新之处；第二个方面主要论述1969年以来人们对Tiebout模型的评述、理论发展与实证分析，这方面涌现出大量的文献；第三、四方面是Tiebout引申出的两个特殊的领域，一为财产税问题，一为财政/税收竞争问题。财产税的受益论来源于Tiebout

模型。财政/税收竞争更是Tiebout模型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提出背景与模型内涵

长久以来，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公共产品在供应上存在三个基本问题：1. 显示性偏好问题：对于私人产品，居民在购买的过程中会显示出他们的偏好，但对于公共物品人们有隐瞒其偏好而搭便车的动机，因此必须用某种其他的方式来得出偏好；2. 社会选择问题：Arrow不可能定理说明，一般来讲，不存在可以同时满足以下几方面迫切需要的社会选择机制：非专制性、可传递性、不相关选择的独立性、帕累托最优；3. 公共产品的管理：对于私人产品来说，厂商有强烈的动机来提供居民愿意购买的产品，并能有效地生产出这些产品，但居民为选择合适的公共产品提供者而获取信息的积极性和公共物品提供者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却不完全一致。对于这三个问题，Musgrave (1939) 和 Samuelson (1954) 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即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 1956.

Stiglitz, The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iebout: A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NBER, 1983.

公共物品不能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与私人部门相比,在公共部门中有相当比例的国民收入没有实现最优配置。

但Tiebout(1956)认为,尽管Musgrave和Samuelson的分析对联邦支出适用,但并不适用于地方支出。也就是说,至少对于那些地方供应的公共产品而言,如果居民能够在社区之间迁移,那么这三个问题都能被解决掉——通过选择社区,居民显示出自身的偏好。社区要么提供居民们需要的公共产品,要么居民们将迁到其他提供更符合他们的偏好的公共产品或者能够有效率地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社区。社区间的竞争就类似于厂商间的竞争,前者 and 后者一样,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帕累托的最优。同时由于每个地区的公共物品与税收组合可能有所不同,各个地区的公共物品支出都尊重了当地偏好的差异性,通过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正如私人物品通过竞争方式提供一样,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是要求有效率的。政府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Tiebout模型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合理的。这对于Oates(1972)提出分权定理以及今后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提供了一个思想的起源。Tiebout认为,具有相同或相近消费偏好的人们会逐渐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共同利益和共同的公共产品消费需求为基础的社区,同质社区就会在均衡时形成。Tiebout模型是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设而进行逻辑推理而来的,这些假设包括:1. 居民能够充分流动,并会流向那些能最好地满足他们既定偏好模式的社区;2. 居民们拥有关于社区间税收、服务组合差异的完全信息;3. 存在许多社区,足以使每个居民住在一个正好满足自己偏好的社区;4. 不考虑对就业机会的限制,假定所有人都依靠股息来维持生活;5. 在各个社区之间,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6. 每一社区都存在一个最优的社区规模,这个最优量是由能够以最小平均成本为其提供服务的居民数量决定。这些假设构成了Tiebout模型的基础,但这些严格的假设

条件也成为了日后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

三、Tiebout 的模型的检验:赞成与批判

人们对Tiebout模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文章发表后的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Buchanan(1961)提出的著名的“俱乐部理论”。其原初范例可以认为是Tiebout模型,但可惜的是,在Buchanan的文章中却只字没有提到Tiebout的文章。这种情况一直到1969年,Oates(1969)发表了《财产税和地方公共支出对财产价值的影响》,Tiebout模型才逐渐为人所知,并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Oates(1969, 1981, 2005等)盛赞Tiebout模型及其重要贡献;Stiglitz(1983)专门写过关于Tiebout模型的25年发展的综述,并且认为Tiebout模型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Fischel(2000)对于Tiebout模型评价很高,认为Tiebout是第一个提出地方政府有可能解决某些特殊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称赞Tiebout在当时提出这个模型所具有的睿智的观察力。可以说,Tiebout在其简短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对于公共物品供给的模式是一种超然的思想,更多的人,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计量化和数学模型化运用的思潮中,在肯定Tiebout模型的独创性时,纷纷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来检验Tiebout模型,对其结论赞成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如Buchanan(1972)在承认了Tiebout模型中具有一些重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Tiebout模型的局限性。

Oates(1969)提供了一些关于地方公共预算对社区内财产价值影响的经验结论。Tiebout模型认为,消费者在提供不同地方公共服务组合的社区间选择,选择能够提供最符合其偏好的税收——支出方案的社区来居住,而各社区根据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来决定其税率。Oates进一步认为,一个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是对来自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收益和税收负担的成本进行权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居民的税收负担成为进入该社区的成本。Oates通过最小二乘法,对地方财产税和地方支出方案对财产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发

Musgrave, The Voluntary Exchange Theory of Public Econom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 1939.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J] Economica, Feb., 1965.

本文此处及下文分别引用了Oates(1969, 1972, 1980, 2005),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Fiscal Federalism, [M]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1972; On Local Finance and the Tiebout Model,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The Many Faces Of The Tiebout Model (sep. 2005) Final Draft.

Fischel, Public Goods and Property rights: of Coase, Tiebout, and Just Compensation, Draft, 2000.

Buchanan, Efficiency Limits of Fiscal Mobility: An Assessment of the Tiebout Model,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Apr., 1972.

现财产税和公共服务上的差别反映在住房价值中:在学校较好和税率较低的社区中,住房价值更高。这表明,在选择居住社区时,潜在居民确实对地方公共产品进行衡量。显然, Oates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 Tiebout 模型提供了经验检验,也为其模型本身注入了新的活力。Tiebout 模型中假设的迁移无成本,并假设公共服务是通过一次性税收来提供资金的,但现实中地方公共服务通常是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实现的——居民支付的税收额取决于他的住房价值,而不是他们的边际收益,这样则存在有些家庭会通过迁往其他社区来改进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均衡还存在吗?因此, Tiebout 模型又引入了一个新的问题——“搭便车者”。在 Tiebout 模型中,“搭便车者”是那些看中了某个吸引人的社区,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那里,但为了避免支付高的财产税而建立小面积住房的居民。在这种迁移下, Tiebout 均衡就会被破坏,各个社区的支出水平也不再有效率,迁移将导致穷人驱逐富人的无穷循环。Hamilton(1975, 1976)认为,通过分区上的限制即可解决这一问题。他在 Tiebout 假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假设,即: 1. 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财产税为公共服务筹集资金; 2. 每个社区通过立法对分区上的限制。如果不消费至少某一最低数额的住房,就没有资格在本社区居住。通过规定最低住房消费水平,让这一水平高于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增加了进入高收入社区的成本。如果让这一最低数量等于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低收入移民们在对于居住地区的选择上,无法成为高成本地区的公共服务的“搭便车者”。这样也就保证了 Tiebout 均衡的存在性,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够是最有效率的治理层次——在地方层次上提供的公共服务如公共教育、治安和消防,通过财产税来为这些服务筹集资金,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显然, Hamilton 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 Tiebout 模型,人们因此也把 Tiebout 模型称作 Tiebout-Oates-Hamilton 模型。在 Hamilton 之后, Fische(2000)全面研究了分区问题,并讨论了“重新分区”和“过度分区”的问题。他认为,地方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成本系统地影响着当地住房的价值。如果不进行分区或者采取其他类似方式,在一个成功的城市内拥有一处住所的收益将很快被机会主

义入侵者侵蚀掉。重新分区是没有效率的,因此要进行合理的补偿。分区也可能过度,从而导致无效率。尽管 Hamilton 模型产生了帕累托有效的结果,但它对现实的要求比 Tiebout 更苛刻。Hamilton 为 Tiebout 模型所补充的两个假设条件甚至要求社区在地方服务和住房消费上的需求都是同质的。

在人们对 Tiebout 模型进行补充、完善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其中的大多数都是针对 Tiebout 模型中近乎苛刻的假设条件。Oates(1969)就曾指出: Tiebout 模型包括的一组假设显然一点也不接近现实,以至于很难让人接受,同时也正是这些严格的假设,使得 Tiebout 模型得到了让人满意的结论,而 Oates 本人虽然认为这些严格的假设与现实世界有很大出入,但他仍认为 Tiebout 模型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Buchanan 和 Goetz(1972)在承认 Tiebout 模型在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个混乱复杂的领域里得到了一些具有明显重大价值的东西的同时认为,即使通过概念上的理想化形式对这一过程进行限制, Tiebout 调整过程也依然内在存在无效率。具体说, Tiebout 模型忽视了两个导致模型本身无效率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地理位置客观存在的这一事实,在经济中的私人产品和市场部门以及地方公共产品部门中,任何资源配置都与空间维度有关,忽略空间维度或者假定它们不存在就是忽视了这一问题的核心;第二个特征是当受空间限定的地方公共产品不足时,即地方缺乏拥有私人产权的业主和企业家,那么地方行政机构就不能完成配置上的效率准则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这一特定任务。Buchanan 赞同 Samuelson 的观点: Tiebout 模型有助于提高居民在社区间的迁移的效率,但是在各个政府公共产品的决定上,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考察及分析的问题。Bewley(1982)更是直接地指出除非在非常严格的假定下,否则 Tiebout 的地方均衡概念并不具有一般竞争均衡的特征。用“看不见的手”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Samuelson 提出的令人困惑的公共产品问题。而事实上, Tiebout 模型做出的是一个近乎严格的结论,如果改变任何一个假设,均衡就可能不存在。在 Bewley 看来, Tiebout 模型之所以能激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或

本文引用 Hamilton 的两篇文章分别是“Zoning and Property Taxation in A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 Urban Studies, 1975; “Capitalization of Interjurisdictional Differences in Local Tax Pric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76.
Bewley, A Critique of Tiebout's Theory of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s, [J] Econometrica, 1982.

者均衡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Bewley证明了如果地方政府是民主型的,也就是说它们试图提高自己居民的福利,那么Tiebout均衡就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Bewley认为Tiebout模型只有在纯粹的自由贸易和纯粹的公共服务的情形下,并且地区数量同消费者的数量一样多的时候才成立,而这样的一种特殊形式没有普遍的真实性,也可以说Tiebout模型不会成为一种一般化的理论。在他的文章中对于Tiebout模型的评价是“我发现了一个把同化了的社会群体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政府混杂在一起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模型”。Oates(2005)在谈到Bewley对于Tiebout模型的批评时认为,一个好的模型就是要将那些不必要的条件略去而关注问题的关键。Tiebout模型之所以是一个好的模型就是因为它所描述的就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有生机的集合。经济模型不可能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完美描述。此后几位学者也对于Bewley的批评做了反应,认为Bewley的处理方法使得他将其自身限制在那种分析的框架中,他没有像他所言的真正的一般性的来考虑Tiebout模型。Epplé和Zelenitz(1978)考察了地方辖区之间竞争本身是否足以导致各地公共产品的有效率的供给。他们和Tiebout一样,也假设这些辖区之间有固定不变的边界,每个辖区赋予政府征税和工业公共产品的权力,而且居民能够在辖区之间无成本地迁移。他们的结果表明,大量辖区之间的竞争并不足以保证公共部门有效率。尽管居民能够“用脚投票”,但土地是不能流动的。因此,政府能侵占一些土地租金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增加辖区的数目能够限制但不能彻底根除任意行使的政府权力。对Tiebout模型的检验很大一部分是从实证出发。Howard和Janet Pack(1978)研究发现,社区中的居民在他们对地方服务的需求上表现出太多的差异性,从而不能与Tiebout式的过程相一致。他们在研究中用收入作为对地方服务的需求近似值。Howard和Pack同时对Tiebout模型中社区同质化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不同偏好的人倾向于混杂地居住在一起。实证研究中的另一条主线包括一系列资本化研究,这些研究检验了地方设施和税收对财产价值的影响(Oates,1969;Rubinfeld, Shapiro, Roberts, 1987),尽

管这些研究在变量的选择和定义以及具体的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还是表明相邻辖区之间在财政上的差异有被资本化到财产价值中去的倾向。

四. 财产税问题

美国的财产税始于殖民地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John Wallis的记载,财产税很久以前就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William Fischel认为财产税是受益税,他认为地方公共项目带来的收益和这些项目在财产中体现的成本将被“资本化”到当地财产的价值中;然而George Zodrow却认为,对资产征税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和地方财政的决策。财产税从它的产生开始就存在着争议,学术界也有众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

Tiebout在1956年的经典文献中没有真正的关于税收方面的具体论述,他仅仅是把税收当作私人市场中的价格,而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地方预算都没有具体的实证处理,这使得整篇文中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谨的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整篇文章是将地方财政决策用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来描述,目的就是试图构建一种地方公共部门和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之间的均衡。在这样一种体制中,个人将显示他们对于公共物品的偏好,而这种方式最终也会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Tiebout的模型中,公共服务是通过一次性税收来提供资金的,而在现实中,公共服务很少应用这种方式筹集资金。Tiebout模型中没有涉及实证研究,也几乎没有提及地方税收,他认为地方的税收只是作为一种地方公共产品价格的替代品,而在美国,地方政府主要依赖的是财产税。正如Rubinfeld(1987)所说的,当财产税被用来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时,Tiebout模型会复杂得多。Oates(1969)的研究说明了社区的公共产品的重要性,通过实证来分析财产税和地方公共支出对于财产价值的影响,并且解释人们买房的同时也是在购买社区。Oates关于财产税转移理论的研究为Tiebout模型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个依赖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预算的世界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搭便车”的激励,正如Buchanan和Goetz(1972)所

Howard&Pack, Metropolitan Fragmentation and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s, [J]National Tax Journal, 1978.

Rubinfeld, Shapiro and Roberts, Tiebout Bias and the Demand for Local Public Schooling,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Statistics, 1987.

Wallace E. Oates 编著, 丁成日译《财产税与地方政府财政》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年版。

指出的,在人口迁移中,一方面人们选择自己喜爱的社区,另一方面支付少于公共服务成本的税收后迁进来的一些人能够“搭便车”。

Fisher(1996)再次探讨了Tiebout模型的局限性和财产税问题。Tiebout模型假设公共服务是通过一次性税收来提供资金的,而现实中,公共服务很少通过这种方式筹集资金。地方公共服务通常是通过财产税来筹资的。当公共产品通过财产税来筹资时,居民支付的税收额取决于他们的住房价值,而不是直接取决于他们的边际收益。

Bruce Hamilton(1975)提出用分区的方法来解决Tiebout模型中的这一无效率问题,也即每个社区都有分区上的限制——如果不消费至少某一最低数额的住房,就没有资格在本社区居住。因此,当存在分区上的限制时,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会处于帕累托有效的水平,并且财产税也将扮演着地方公共服务的有效率价格的角色。因此,财产税被当作居民得到公共服务的价格。要使Tiebout均衡存在,就需要存在足够多的社区,这些社区能够提供对于公共产品的各种需求,而且为各种类型的居民提供住房。也就是说,一个社区内的所有居民不仅在公共服务的需求数量上相同,而且在住房水平上也相同,这也意味着社区内是同质的。

从本质上说,Tiebout模型是一个长期模型,社区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居民们能够完全根据自身对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务/税收组合的需求来自行分类。而在短期内,可能会发生公共服务和税收的资本化。因为,当社区供给固定时,不同类型的居民将为符合自己偏好的社区中的住房展开竞争。在其他方面不变的条件下,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公共服务质量更高或者财产税率更低的社区中财产价值更高。也就是说社区的税率和公共服务被资本化到居民的住房价格中去了。短期内,由于住房供给没有弹性,资本化将会发生;在长期,当一个大城市区域中社区数量具有完全弹性时,资本化将不会发生,因为对公共产品需求更高的居民总是可以选择迁往一个新社区,而不是为当前社区中的住房支付更高的价格。

在一个完整的Tiebout价格体系中,地方的财产

税等于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虽然财产税被看作是一种对于资本索取的税收,但是在一个整体的税收均衡中,居民所缴纳的税收等于他们所得到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财政差异的资本化与消费者在地方辖区中进行选购的观点是一致的。为了住在那些提供好的学校和更高安全保障的社区中,人们似乎愿意支付更多。对于这一点,Oates(1969)就曾给出过实证分析。Hamilton(1976)、Epple和Zelenitz(1978)也指出,完美的Tiebout均衡意味着不存在任何资本化:在地方辖区具有完全供给弹性时,从更高水平的设施中获得的收益将正好被地方税收账单中相应的增加所抵消。

五、财政竞争问题

Tiebout模型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是财政竞争与政府支出的效率问题。西方财政竞争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增进效率说”和“降低效率说”两类。前者认为,财政竞争的结果会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 and 个人的福利水平;后者认为,财政竞争影响了政府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社会和个人的福利水平。

“增进效率说”也正是从Tiebout(1956)发展而来的,虽然Tiebout通篇未提及“财政竞争”,但是他的文章却蕴含着财政竞争“增进效率”理论的思想。Tiebout的“用脚投票”认为将更多的财政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竞争。居民在地区间流动,选择能够提供最满意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的地区,可以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率。这就是后来Oates的“分权定理”。对于公共品来说,地方政府能够向各自的选民提供最有效的产出量,而中央政府却无法实现这一点。Besley和Smart(2001)提出了两种方法可以驯服Leviathan(又译“怪兽”),一个是用手投票,一个是税收竞争,主要是通过用脚投票方式。他们假设政策制定者是Leviathans,追求自身的收入最大化,而财政竞争正好可以对政策制定者形成有效的约束,从而提高了政府活动的经济效率。Keen和Kotsogiannis(2003)也从资本税竞争对Leviathan的抑制作了研究。

Oates(1972,1999)的研究也被认为是“降低效率

Fisher, Public Choice Though Mobility: The Tiebout model, *JJ State and Local Public Finance*, 1996.

这里引用的两篇文章分别是 Besley & Smart, *JJ Does Tax Competition Raise Voter Welfare?* 2001; Keen & Kotsogiannis, *Leviathan and Capital Tax Competition in Feder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3.

说'的代表,他指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减税,使得靠税收融资的地方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量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地方支出水平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而Zodrow和Mieszkowski(1986)对税收竞争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提供了正式的模型解释,他们的结论与Oates(1972)相同,辖区间政府竞争会造成政府公共支出的降低。Wildasin(198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一个地区的税收制度对另一个地区的效应可以看作外部性,一个地方对资本课征高税,一些资本将转移到其他地区。各个政府都趋于征低税,提供不足的地方公共品。Keen and Marchand(1997)指出了税收竞争会影响政府支出的构成,地方政府会偏好有利于吸引投资的支出,而降低其他方面的支出。研究进一步表明只要有流动资本,财政竞争会导致政府基础设施的过多投入,直接影响消费者福利的项目如社会服务的过少提供,财政竞争会带来额外的福利损失。

可以说,无论是“增进效率说”还是“降低效率说”,根本原因都在于研究起点不同,两种财政竞争理论都有合理之处,它们都注意到了财政竞争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而Tiebout模型对于双方的启发意义都是重大的。

Stiglitz(1983)认为Tiebout模型在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可以说,Tiebout模型的政策含义远远不止地方公共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方面,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Tiebout模型,可以说经典的Tiebout理论意味着政策具有的差异性。正如竞争性的市场提供各种产品一样,在由竞争性辖区组成的世界中,可以提供不同税收和收益组合的辖区。Ronald Rogowski(2000)提到当劳务在辖区内自由移动时,Tiebout效应使得辖区间的政策差异性很大,而当资本能够流动时,会使原本有利于资本的辖区变得更加有利,而原本不太有利的辖区更加偏离资本所要求的政策。在较长的时间

内,这预示着将要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国家对资本相当有吸引力,而另一个则相反。

六、结 论

充满幽默的Tiebout为公共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地方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用脚投票”的理论也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词汇,Tiebout模型及其思想在公共财政、公共选择、民主选举,乃至证券市场的研究中都得到应用,由此引申出来的资产价值问题、分区问题、分权化问题,还有学校以及政府之间的博弈等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50年来,Tiebout(1956)及其思想在人们的质疑、批判、检验、支持的交锋中得到传播和发展。Tiebout给我们以重大的启示,给我们以深刻的影响;未来的50年,人们对Tiebout模型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其理论在各相关领域会得到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 (1) C.V. 布朗、P.M. 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2) 曹荣湘、吴欣望《蒂布特模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3) P.M. 杰克逊著,郭庆旺、刘立群、杨越译《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年版。
- (4) 哈维·罗森《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5) Wallace E. Oates 编著,丁成日译《财产税与地方政府财政》,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年版。
- (6) Berglas, E., On The Theory of Club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6, No.2 (1976), pp.116-121.
- (7) Besley, T. and Coate, S., Centralized vs Decentralized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 (8) Edel, M. and Sclar, E., Taxes, Spending, and Property Value: Supply Adjustment in A Tiebout-Oates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2, pp.941-54.
- (9) Fischel, W.A., The Homevoter Hypothesis: How Home Values Influence Local Government Taxation, School Finance, and Land-use Polic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安莹)

Zodrow and Mieszkowski, Pigou, Tiebout, 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6.

本段文字中引用的文献分别是 Wildasin, Interjurisdictional Capital Mobility: Fiscal Externalities and a Corrective Subsi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9.

Hoyt, Property Taxation, Nash Equilibrium, and Market Power,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1.

Keen and Marchand,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7.

Roland,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Implication of Tiebout Model for a world of Mobile Factors, UCLA, 2000.